



立夏惊雷震神州

——记1929年立夏节起义

□ 胡遵远

1929年5月6日（农历立夏节），在中共商罗麻特别区委的领导下，安徽金寨（当时属河南省商城县管辖）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立夏节起义（也称商南起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留下了重要一笔。

出其不意提前举行武装起义

1929年3月13日，中共豫东南特委和鄂东区特委在河南梁山保附近的南竹园举行联席会议，根据上级要求并结合本地实际，作出了“积极准备，尽快发动商南起义”的决定。由于当时商城县委遭敌破坏，会议决定商南党组织暂归鄂东区特委领导，以便就近指挥。为加强鄂豫边区领导，鄂东区特委决定将商城的南部、罗田的北部、麻城的东部划为一个特别区，成立中共商罗麻特别区委，领导商罗麻三县边区的工作。

4月，中共商罗麻特别区委在金寨吴家店太平山成立。这个时候，商城反动当局加紧了“清乡”，各地民团都在内部清查可疑分子，中共商罗麻特别区委敏锐地意识到：准备已久的武装起义如不适时发动，地方党组织和革命力量随时都有可能遭受破坏。于是，5月2日在吴家店太平山穿石庙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举行起义问题。会议认为党在商南的工作发展很快，已掌握了一定的武装，与其坐等敌人来收拾，不如利用现有力量先发制人。会议决定改变原定在中秋节举行起义的时间，提前到5月6日（阴历3月27日）立夏节的晚上，趁民团忙于过节、疏于戒备之机，举行立夏节武装起义。

5月4日，商城县委书记李梯云协助商罗麻特别区委书记徐子清，在金寨关庙园高氏祠召开商南各支部和农民武装负责人会议，传达特别区委的决定，具体部署起义行动。按照计划，起义采取统一指挥、分区城行动的方式进行。起义时间定为5月6日午夜。会后，各起义点的党组织按照特别区委的布置，紧急行动、积极准备。

不动枪和炮，智取大王庙

5月4日晚上，周维炯在丁埠大王庙后面的山林里秘密召开党支部会议，传达上级会议精神。他说：“我们的任务就是夺取丁埠民团的枪，全歼民团。行动直接影响到立夏节起义的成败，怎么个打法？同志们要好好合计合计。”

年轻且性格急躁的严运生站起来说道：“我们可以趁其不备，夜袭民团，直接砸它个稀巴烂。”直言直语的王玉田说：“不就30来条枪吗？我看瞅准机会，偷偷地把它偷走算了。”年龄偏大、沉着稳重的田继美说：“丁埠民团是杨晋阶（商城县民团头目之一）的主力，不仅枪好，而且民团中还有他的亲信走狗。依我看，我们还

是想一个稳妥的办法，最好是智取。”“哎，这个主意好，咱们就来个智取大王庙！”周维炯赞赏地说。

立夏节那天，吃晚饭的时候，周维炯采取计策，让民团的队长、副队长和团丁们个个喝得烂醉。等到时机成熟后，周维炯大喊了一声“动手”，和他一样打入民团内部的同志们立即收了墙上的枪支，把民团的队长、副队长捆了起来。周维炯对民团团丁们说：“弟兄们，不要惊慌，我们就是共产党，我们共产党是专门打富济贫的，是给穷人出力撑腰的，有愿意干的就留下，不愿意干的可以回家。”民团士兵见周维炯就是共产党，又听说共产党是打富济贫的，大多数都愿意留下来跟着共产党干。

各地起义捷报频传

与此同时，吴家店、包坂、斑竹园、沙堰、沙河、西河、李集、南溪等10多个地方也举行了暴动，并取得了全面胜利。

吴家店竹叶庵驻有罗志谦民团30多人。午夜时分，徐子清等带领农民武装50多人，将竹叶庵围住，由民团中的共产党员周厚玉、林树生作内应，顺利摸掉敌人的岗哨。农民武装冲进去，敌人全部投降。

沙堰徐王庙驻有岳正富民团一个班。在解决了斑竹园的文昌官民团的同时，李梯云等带领沙堰农民自卫军30多人在打入敌内部的共产党员徐先甫配合下，以给岳正富送信为名，喊开了大门，包围了敌人寝室。李梯云大喊：“我们是农民自卫军，你们要不投降，都休想活命！”团丁们听说岳正富已经投降了，自己又被包围，只得缴械投降。接着，农民自卫军又连夜奔袭长岭关附近的大屋湾，活捉了国民党河南省党部委员、大恶霸罗维楚。

洪学智等200多名联庄队员、农协会员和詹谷堂率领的明强学校一部分师生，举着红旗，拿着火把、大刀、土铳，集会火神庙。詹谷堂在会上宣布南溪农民暴动胜利。

立夏节起义的历史地位

这次起义是鄂豫皖地区三大起义之一，也是首次取得全面胜利的革命武装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商南地区的反动势力，极大地鼓舞了鄂豫皖边区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开展武装斗争的信心和决心，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红军建设注入力量。1929年5月9日，立夏节起义胜利后的第3天，各路起义武装就会师在金寨斑竹园朱氏祠，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2师。1930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将红32师和稍后同在金寨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3师与先期在湖北成立的第31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直属中央军委指挥。1931年1月，红1军与红15军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同年11月7日，红4军与同在金寨成立的红25军组建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可以说，立夏节起义所诞生的红32师是大别山区组建最早的红军队伍之一，是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1军、第4军和红四方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八路军129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71、77、78集团军的重要源头之一。

推动了革命根据地建设。立夏节起义胜利后，不仅迅速组建了红军队伍、建立了革命政权、开展了土地革命，而且创建了以金寨汤家汇、南溪、斑竹园为中心的豫东南革命根据地。随后，与皖西革命根据地、鄂豫边革命根据地一起，建成全国六大革命根据地之一、位居全国第二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成功经验值得借鉴。立夏节起义的许多做法，比如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凝聚斗争合力；坚定理想信念、发扬牺牲奉献精神；及时地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坚持在斗争中积累经验；实行兵运农运结合、把敌人统治较薄弱的山区作为开展武装斗争的突破口；切实加强党的领导、深入一线、靠前指挥作战；认真谋划、统一领导、精心组织、协调作战；及时组建革命武装、建立红军队伍、夺取政权、开辟革命根据地等等，对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具有启示作用。

毛泽东指导新中国战争准备的高超艺术

□ 赵韦博

核心阅读

新中国成立以来，面对两强争霸、敌强我弱的基本战略态势，毛泽东总是慧眼独具、直击要害，以极富预见、极有魄力、极具创意的战争准备实践，有效达成了战胜对手、慑止强敌、固国强边的战略目标，在新中国军事斗争史乃至世界军事史上留下了光辉篇章！

战争爆发样式，是敌对双方使用军事力量开启交战的具体方式。在首先搞清主要作战对手这一问题之后，毛泽东总是即刻将目光聚焦于主要作战对手的若干重大政治军事特点上，善于摸透主要作战对手发起战争的可能战略背景以及具体手段方式，进而有针对性地进行战争准备。比如，他注重基于历史规律、现实战略、经验教训多个维度，科学分析和把握主要对手挑起战争的通常方式。正是基于这些判断，毛泽东将战争准备的“未来背景”预设为强敌介入、甚至主导的反干涉战争，切实想全备实，为战争准备预设了科学前提。

洞若观火，力避两线作战危局。两线作战，从世界战争史来看是最大的战略危险。然而新中国成立以来，却长期面临来自多个方向的战争威胁，故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准备两面甚至多面作战。但也要清楚地看到，在这一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战略问题上，毛泽东总是

保持着高度的战略清醒。1962年中印武装冲突爆发前，毛泽东在对印官方答复的信中指出“中国不会那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就是力避印度将中国视为主要作战对手，防止出现西南方向和东部沿海方向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毛泽东在探讨《对美方口信的答复》稿时亦指出：“口头上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是不能两面作战。”毛泽东不光认识到这一战略危险，还善于在战略策略上运筹帷幄加以避免：一是通过外交分化孤立主要作战对手，以政治斡旋化解两线作战危机。毛泽东在谈及1954年日内瓦外交斡旋的成功经验时提出讲和平、联合多数，反战争、孤立少数的外交斗争策略。这一策略实质就是坚持有所缓和、有所紧张，重点突出应对主要作战对手，同时应尽力避免四面树敌，为战争准备营造有利战略态势。二是

军队参与联合国维和新风险与应对

□ 李继东

维和任务区的特殊环境条件；任务区部署后，维和部队应着眼任务区安全形势变化和任务风险，周密研判遭遇武力袭扰、平民保护等多种情况的应对预案，加强陌生环境下的实战战备与演练，提高部队临机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适时组织与外军的联合应急、处突演练，提高实战应对的协调配合水平。

三是完善联合国维和相关法律规则。《联合国维和行动原则与指针》规定“除自卫和保卫授权使命外不得使用武力”，明确联合国维和部队武力适用范围包括自卫和履行职务两方面内容，赋予单纯自卫权之外执行任务所必需的武力运用的合法性。应依据国际法、联合国有关规定和本国法律法规，尽快制定专门适用于中国军人参与联合国维和和平行动的“交战规则”，切实做到“有法可依”，使维和官兵在遇到突发紧急情况时能够准确掌握使用武力的范围、条件和程度，熟练掌握比例原则、最低限度使用武力和最低限度损害等原则，提高我国维和部队遂行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正当合法性，有力维护我合法权利和生命财产安全。

四是增强在联合国维和中的话语权和领导地位。在联合国维和行动领导管理体系中拥有领导权，不仅在维和战略决策占优势地位，而且更好地保障本国维和部队在任务区的权益。由于长期占据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很多关键职位，美英法等国派出的维和部队、维和警察人数很少，却能够长期领导联合国维和事务。中国现在已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中派出军事维和人员最多的一个国家，却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在秘书处职员人数最少的国家，且多数在执行层和行动层，很少有人 在联合国秘书处维和事务主管部门与维和行动任务区担任主要领导职位。在维和军事行动中，我国更

多的是参与者非主导者，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维和行动的成效。为强化联合国维和行动上的话语权、决策权和影响力，积极争取更多的维和行动领导、管理和指挥岗位，要主动提出维和行动议程，在维和行动决策、经费使用管理和重大行动部署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引领维和行动事业正确的发展方向。

五是加强维和理论研究为维和行动提供智力支持。当前中国维和行动规模和层次都在上升，迫切需 要对中国维和实践和理念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全面系统的理论支撑指导。实践上，联合国维和行动涉及行为体多、环节多、程序复杂，需要予以系统的经验总结；理论上，维和研究涉及国际关系、国际法、军事学、民族宗教等多个知识领域，涉及预防性外交、武装冲突法、人道主义干预、平民保护、危机管理等复杂议题，急需专业化研究。一方面，目前我国仍缺乏联合国维和的专业与学科，对军队参与维和的学术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成果难以为国家和军队维和工作提供充分的智力支持。另一方面，经过近30年的维和实践，中国军队已经储备了大量具有维和经历的军事观察员、指挥官和技术人才。可集中统筹这些来之不易的人力资源与知识财富，依托军队和地方高校相关教学研究机构，借助于维和训练基地的帮助，尽快推动维和理论教育培训的建立发展，为国家 和军队更好地履行维和使命提供充分的智力资源保障。

